

世代與時代，現實與鄉土
—70年代的文化政治

Generation and Epoch / Reality and
Nativism: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1970s

蕭阿勤 | A-chin Hsiau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Research Fellow and Deputy Director,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t Academia Sinica

朱銘美術館吳順令館長，還有各位來賓，各位美術界的朋友，大家早！

今天早上天氣其實不是很好，前幾天還風和日麗，今天天氣就變很快。這就好像 70 年代的開端，差不多也是今天早上的這個狀態。接到美術館的邀請，請我來跟各位分享我的研究的時候，我一直在想，要怎麼跟各位談 70 年代，特別是在這樣一個充滿美術界先進的場合，要怎麼樣跟大家討論。

我想就找出幾個關鍵字來談一談，跟各位分享我對 70 年代的看法。這幾個關鍵字就是主標題——〈世代與時代，現實與鄉土〉，從這幾個角度，我特別要去講 70 年代的文化跟政治之間的關聯。

我們這個研討會的主題是「以當代之眼穿越時空」。這是一個充滿了回顧意涵的標題，事實上我們個人跟社會存在的基本狀態，就是不斷地在時間流逝的過程中，去回想過去、現在和未來。譬如說時間社會學等的研究，跟心理學一樣，都告訴我們，這是個人或集體生活存在的一個基本狀態。

我們現在有一個流行的字眼叫做「認同」，認同牽涉的是，我們會不斷問自己是誰？我要做什麼？我要往哪裡去？對我最好的利益是什麼？我該怎麼樣掌握生活？我應該怎麼樣生活、過得有意義？所謂的認同，如果從時間的角度去看，大概就是人活在時間中，在不可避免地往前走的過程裡，以回想過去、面對現在、揣想未來的方式，不斷地去回答我剛才講的那些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核心是——我是誰？不過我們知道要用當代之眼穿越時空，意涵已經很明顯了，就是說不可能沒有一個觀點，我們到底要用什麼觀點，從現在去看過去、去想像未來。剛才開幕時吳順令館長特別講到，會舉辦這個研討會的原因，除了回顧過去，事實上是要展望未來。從這點來看，那麼對我們最大

的挑戰，還是在於觀點。

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就是：我們要如何去說 70 年代的故事？不過我想要跳開一層，除了我們自己怎麼去講 70 年代的故事之外，今天演講的重點，也在於想去看一看，70 年代的他們怎麼講故事。我剛才說，講故事的時候，不管怎麼樣的故事都有觀點，要把故事講好，恐怕最大的挑戰是那個觀點的掌握。我今天就想從「世代」跟「敘事」這兩個觀點，去談一談 70 年代他們是怎麼講自己的故事。在面對那樣的時代，剛才吳館長其實已經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簡單的描述，描述 70 年代大概是怎樣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人們怎樣面臨新的局勢，怎樣去反思他們自己，說他們自己、還有說整個社會的故事。所謂的「敘事」，在定義上，各位可以暫時將它等同於「故事」。我就從世代和敘事的角度，來簡單討論 70 年代的政治和文化。至於美術，我不敢多談，因為我是門外漢。

談世代的時候，我們就會牽涉到少數人跟多數人的問題。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場是在歐洲，而各位很多人應該都讀過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翻一翻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我們可以很清楚瞭解，他談的很多就是他們那一代的年輕人，18、20 幾歲，大概 18 到 30 歲中間的。這個世代的人，第一次面臨這麼恐怖的戰爭，他們經由這個戰爭，重新認識他們上一代向他們灌輸的話，到底是對的，還是不對的。這部小說裡面，有不少對於上一代不言而喻的批判、對上一代看法的幻滅。他們重新認識自己這一代所面臨跟上一代完全不一樣的命運。有人把這樣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世代，叫做「1914 的世代」，這在很多世代研究裡，都曾經提到。在文學裡面，我們看到更多這種關於世代的描述，譬如說海明威屬於「迷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 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就那些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們

來說，像海明威這樣的文學菁英，其實是整個世代的人群中的極少數，如果我們畫一個金字塔的話，他們恐怕是那個世代的金字塔頂端，小小的一角。今天的演講，我要談的，正是比較屬於知識分子文化菁英、屬於少數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活躍分子。

不過我們知道，在很多社會中，尤其是快速的、急劇的社會變化裡，往往是少數人影響、決定了好多的事情，他們甚至影響到後來好幾代的人。世代的研究，如果將重點放在文化、藝術或是政治的意識型態上，那麼通常要關注的是少數人，也就是那些發揮重大影響力的少數人。今天演講要談的，特別是知識階層的年輕世代，也就是我稱為「回歸現實世代」的一群年輕人。在 70 年代的臺灣，他們不斷地問自己是誰，而且不只問我是誰，還問「我們」是誰，問個人也問集體。他們追問我或我們從哪裡來、現在處在什麼狀況、要往何處去。我的討論重點，比較放在跟集體認同有關的那些世代的問題。

簡單的說，關於 70 年代的這樣一個故事，就是這一群年輕人怎麼從一種追求「現代中國」的世界觀，轉變到回歸鄉土現實。從 70 年代在整個臺灣戰後的文化、政治變遷中的位置來看，這是一個從追求現代中國，進而反省、自我批判，轉到回歸像鄉土現實的十年。不過這種轉變，不是每一個人都很整齊，好像下一個口令大家就一起轉變，並不是這樣子的。我要描繪的是十年左右的大致的趨勢。

我們要瞭解 70 年代，還是多少要回顧一下 60 年代。看看 60 年代是什麼樣的時代，才會瞭解我們要討論的那些 70 年代的年輕知識分子如何轉變。我們都很清楚 60 年代是一個以美、蘇為主的冷戰時期。跟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有關的，是 60 年代的兩個重大的特徵，特別是在人口與教育這兩個方面。這兩個特徵在全世界都很像，首先是人口方面，戰後的年輕人口大增。這些戰後的年輕人口，包括 1945 年之後出

生的，也包括 1945 年大戰剛結束的時候剛剛上小學，或者是出生不久的那些年輕人口。美國、蘇聯，乃至包括中國大陸、法國、拉丁美洲等等都一樣，年輕的人口大量增加。跟年輕人口大增同時出現的，是高等教育的擴張。這個時期另外一個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冷戰時期，同時也就是現代化思潮高漲的時期。在現代化的思潮影響下，當時的人們，普遍認識到他們所處的是一個從傳統社會要變遷到現代社會的關鍵時期。當時流行的想法是，要追求好的社會、富足的社會、強大的國家，就要追求現代化。這是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甚至到 80 年代中期，一個橫跨全世界、占有主宰地位的意識型態。

在這個現代化意識形態主宰的時代裡，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也就是大專、大學以上的教育，被當做追求國家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工具，是培養下一代成為現代化生力軍的重要工具。但是年輕人口的大增與普設大學、高等教育發達，培養更多的大學生，甚至更多的研究生，這對社會來說，可能也培養了一大批潛在的社會不滿者。一個社會培養了大量的知識分子，會馬上面臨的問題之一，就是就業的問題。另外，在 60 年代，流傳了許多批判當時冷戰格局的一些思潮。譬如馬庫色 (Herbert Marcuse) 的《單向度的人》，批判資本主義下的工業社會、消費社會、商品氾濫對人性與心靈的宰制。另外例如 Daniel Bell 所寫《意識型態的終結》，宣稱冷戰的 50 年代以來的歷史經驗，顯示西方 19 世紀產生的各種意識形態（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對世界的看法，已經站不住腳。綜合來說，在 60 年代廣泛流傳著不滿的思潮，這些東西都在西方的大學校園裡流傳。年輕的知識分子想要尋找新的替代道路，無疑在反抗舊時代跟上一代。這是世界的普遍狀況，包括日本、韓國，大致都一樣。